

上高县城东北角的镜山口,84年前曾发生过一场雄浑悲壮的大会战,被军事当局盛赞为“抗战4年来最精彩之作战”“开胜利之年胜利之先河”“属空前战捷”。1991年,上高县人民政府在此修建“抗日阵亡将士陵园”,园名为张爱萍将军题写。

7月下旬,炽热骄阳炙烤着位于赣西北的上高大地。记者循着史料的记载,探寻那场军民同心、痛击日寇的上高会战。

在陵园内一堵上高会战时留下写有“军爱民,民拥军,军民合作打日本”的标语墙前,记者遇到前来研学の上高县敖阳街道桂林社区的学生。大家皆静默无语,独蝉鸣声声,似乎在为来访者讲述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壮烈故事。

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

——寻访上高会战抗战印记

宜春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记者 熊妍华 刘和星 李澄

烽火淬炼

赤胆忠魂灭寇寇
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

1941年1月,日本参谋本部调整对中国战场的作战方针:“……不再进行大规模作战。如果需要,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,以截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……”

2月中旬,驻扎在江西安义的日军第33师团接到命令,准备前往华北地区;而换防过来的新编日军第20混成旅团已至;加上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、赣西北地区的日军实力达到6.5万人。鉴于此,日军第34师团向第11军司令部提出,对以上高为核心的赣西北地区进行一次“灵活、短距离的截断作战”,摧毁驻扎在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,掠夺该地区的战略资源,造成恐怖气氛,以达到稳固南昌占领区的目的。

1941年3月15日凌晨,日军第33师团首先发难,上高会战打响。

日军兵分北、中、南三路,以上高为目标,分进合击,奔袭而来。北路为日军第33师团一部1.3万人,南路为日军第20混成旅团主力8000余人,中路为日军第34师团2万余人,另配属日军第三飞行团、海军航空队、后勤部队6000余人,总计进犯兵力4.7万人、飞机100多架,并强拉民夫1万余人,妄图形成“苍鹰搏鸡”之势,“啄”取上高。

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日军,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,统一指挥第70军、第49军、第74军、第72军,第二挺进纵队和江西保安纵队共7.5万人,设置三道防线:第一线为市汉街、锦江南岸、祥符观等,逐次抵抗,诱导日军;第二线为仙姑岭、老坑岭、苦竹坳等,依托山地,消耗敌人;第三线为钩石岭、泗溪、官桥、棠浦一线作为主阵地,与日军决战。

兵犹火也,不戢自焚。1985年出版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《江西抗战亲历记》中,刊载了上高会战时任县长的黄贤度,以笔名“王道平”撰写的《长留浩气满乾坤——上高会战片段回

忆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打扫战场,敌我双方都留下了累累尸体,点数都点不清,可见上高会战之激烈残酷。日本侵略军伤亡是非常惨重的,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”可见此战之惨烈。上高会战共持续26天,中国军队用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,毙伤日军1.5万余人,缴获大批武器物资,以中国军队彻底粉碎日军战略意图、寸土未失、取得会战的完全胜利而载入中华民族抗日史册。

第19集团军战后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:“民众用命,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,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。”

“其实,‘民众用命’不仅仅体现在交通破坏上。当时,上高人口仅12万,在中共上高地下党的带领组织下,参与支前的青壮劳力就达到3万多人。”上高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、上高会战史研究者曾鸿祥介绍说。

军民同心

踊跃支前护家国

赣西北的战事,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。1941年3月16日至4月10日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分7天刊发了22条有关上高会战的消息报道。中共特别党员黄贤度,也是在党的支持下,于1940年出任上高县县长的,其党的关系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单线领导。

利用黄贤度县长身份这一有利条件,中共江西省委派遣了一批地下党员到上高,并先后成立了县政府支部、上高中学支部。中共上高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,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书写下“宁为战死鬼,莫做亡国奴”“老表武装起来,保卫家乡”“争取最后胜利”等大量抗日标语,“军爱民,民拥军,军民合作打日本”标语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所书,为上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扎实群众基础。

上高会战打响当天,正在萍乡开会的黄贤度当即离会,步行一天一夜,赶回上高。在途经第19集团军司令部驻地时,黄贤度

面见了总司令罗卓英,表达了上高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决心,并作出“3个保证”:保证军粮弹药的运输,担架队的及时跟进;保证电话、电报的畅通无阻;保证后方没有汉奸投毒、放火等情况的发生。

中共上高地下党根据黄贤度的要求,积极加入抗击日寇行动中来;加强控制区、乡政权,以便发动民众加入支前队伍中来;合并县中队及警务中队,在各重要交通要道及路口放哨站岗,防止敌特活动;集中全县武装力量编成3个大队,一旦上高失守,便上山打游击,坚持长期抗战;黄贤度利用县长的身份,筹措粮草,支援前线。上高会战期间,上高每日供给军粮达3000公斤之巨。

在战斗最激烈的3月22日,黄贤度等中共地下党员还冒着枪林弹雨去前线慰问将士,让前线将士感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。当中国军队无法渡过耶溪河时,中共上高地下党发动群众连夜抢修浮桥,家家户户纷纷卸下自家门板用来铺桥。“这一现象被记者发现后加以报道,一时间上高‘无门县’的称号便传开了。”曾鸿祥介绍说。

上高民众的支持远不止于此。全县3万多名青壮劳力冒着枪林弹雨支前:在几十公里的湘赣公路,埋下地雷,打上石柱,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优势丧失殆尽;战事吃紧,背着沉重的弹药箱,奔赴前线;士兵受伤了,及时抬送到后方接受治疗;电话线路被敌军破坏,重新架设……“当时真的是‘前线需要什么,群众就提供什么,将士们缺什么,群众就供应什么’,军民同心、军民合力达到空前程度。”曾鸿祥说,“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驻扎在翰堂道陂村3年之久,在村民的掩护下,硬是未被日军发现过,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”

“军队没有民众,打不了胜仗”,这是当年《江西民国日报》战地记者采访上高会战后的感慨。谈到上高会战取胜因素时,罗卓英多次提及“民众效能”“民众用命”,对民众的支前表达充分肯定。

缅怀先烈

强国富民承遗志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牢记历史,是更为好开创未来。

硝烟散尽八十余载,上高会战的历史印记仍在这片土地上清晰留存。日前,记者一行深入上高县城及周边区域,踏访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园、中国军队军需储备旧址、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、中国军队后方征粮站旧址等上高会战遗址,实地了解当地对历史遗存的保护利用、纪念传承工作,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精神财富。

烈日下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庄严肃穆,已成为上高县及周边地区缅怀抗日先烈、弘扬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。上高县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平介绍,自陵园建成后,每年清明节都有大量民众自发前来敬献花篮。作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陵园也常年接大量研学团队,通过实地参观、历史讲解等方式,让学生直观感受会战历史。

上高县内遍布着各类与会战有关的支前旧址。这些由祠堂、民宅改造的场所,是军民协同抗战的直接见证。2000年之后,上高县人民政府对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、中国军队军需储备处、中国军队后方征粮站等15处旧址进行了修缮,对其中数处旧址做了复原式陈列,且对外开放。

文艺创作也成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。2017年,由北京御景江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《我的上高》正式上映,次年斩获第16届中国电影频道“百合奖”优秀故事片一等奖,让这段历史走向更广阔的受众。上高本土青年作家杜青,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决战上高》《上高会战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《活着就是见证——上高会战亲历者口述历史》,通过文字留存亲历者记忆。

历史从未远去,它就藏在每一次踏访的脚步里,每一次触摸的温度里,每一次对“为什么而战”的追问里。上高会战,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,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;上高会战遗址,不仅仅是一处处地理坐标,更是吾辈当自强的精神高地。

抗日阵亡将士陵园。宜春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记者 周亮 摄



战地服务团成员合影。资料图由曾鸿祥提供

1938年至1940年,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19集团军转战赣北。团长是中共党员胡兰畦,团员由成立时的11人增加到37人,其中16人是中共党员。党组织关系前期归第四军南昌办事处领导,后期归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。在上高县翰堂道陂村,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易名为第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。服务团不定期驻扎在翰堂村祠堂内,在驻地附近组织了妇女识字班、儿童团歌咏队,气氛非常活跃。

服务团在上高一带,主要的工作是向官兵和驻地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,成立战场剧社,表演节目慰问前线官兵,救护伤病员,调解军民矛盾等。

据服务团团员戴再民《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工作的前前后后》一文回忆:“1939年10月,我来到服务团工作,给团员排演张客的《最后一颗子弹》;1940年元旦,在第19集团军司令部演出了洗群的反正》《一百零一夜》《最后一颗子弹》;春节期间,我们排演了田汉的话剧《最后的胜利》(四场)。演出时都请了不少驻地百姓来观看。”

2017年,上高县博物馆一行人到湖南衡东县采访时年97岁的服务团团员林曼萍。她回忆道:“1938年11月,我随胡兰畦到第19集团军司令部参加了服务团。1939年至1940年,我们在赣北一带开展工作。其中,我在上高翰堂办墙报,演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宣传抗日的节目。驻地百姓经常给我们送瓜果蔬菜,上高老表很热情,我们团长给他们钱,他们都不收。”

翰堂左兵典老人早年回忆:“战地服务团在翰堂期间,我正在读小学,服务团的音乐队长李平每个星期来我们小学上音乐课,还常办音乐竞赛。我学唱了《壮丁受训歌》,歌词是:好铁要打钉,好男要当兵,保家乡,杀敌人,发动游击战,一面种田,一面拿枪,老百姓去打仗,才能保家乡。”翰堂道陂村卢长贵老人曾回忆,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兵来翰堂时,他才六七岁。她们在村里办了儿童识字班,村里小孩在识字班认字学歌,内容有:“小小兵,志气高,一二一,学兵操。日本人真可恶,杀人又放火。你是中国人,我是中国人,他是中国人,我们都是中国人,杀日寇保家乡”等。服务团还经常在地放映抗日的无声电影,当地老百姓称看“哑巴子戏”。

3年间,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员用自己手中之笔,忠实记录下了亲身体验的许多战斗和生活经历。出版了《战地一年》《战地二年》《战地三年》3本书,引起了很大反响,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,也为历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。服务团还编了一本通俗刊物——团刊《战鼓》,铅印了63期,最后一期是《悼念周文南同志逝世特刊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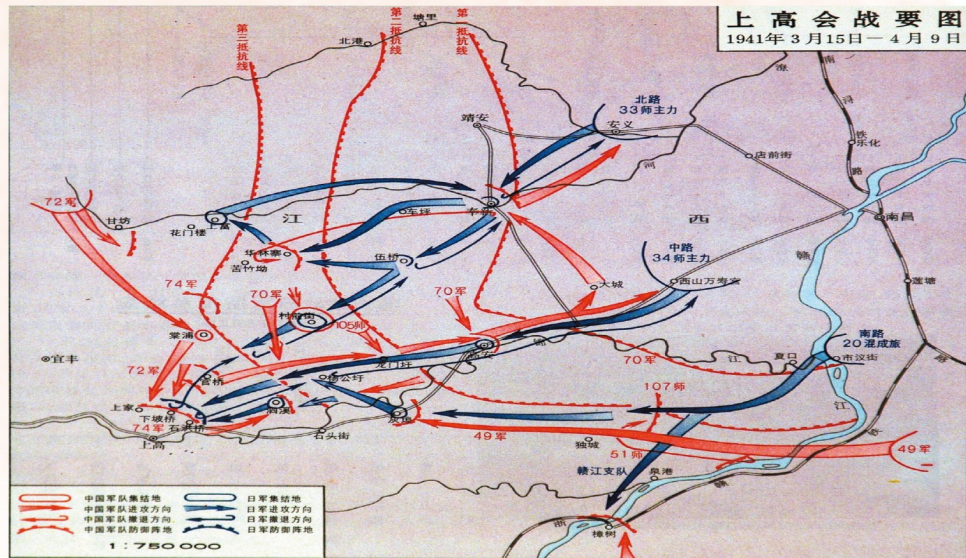
绰号“小诗人”的周文南,1938年3月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,同年10月在武昌经特批成为年轻的共产党员。在服务团3年,周文南写下数十篇战地通讯,刊登在各地报刊上,其中《翻过天目山——到孝丰西亩镇》《女兵变成老百姓》《参观士兵的小组会》《祭奠三百勇士》《大演习》等文章深受欢迎。1940年7月,周文南在打扫战场时因劳累过度染上伤寒,但高烧40摄氏度还坚持参加慰问演出。由于当时治疗条件有限,周文南不幸被病魔夺去18岁的花季年华。

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战地忘我服务,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。她们是战火中的巾帼英雄,将被永载抗战史册。

(作者系上高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)

战火中的巾帼英雄 ——妇女战地服务团在上高的日子

曾鸿祥



资料图由曾鸿祥提供



学生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研学。

宜春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记者 周亮 摄